

晚期地租主义视角下海湾国家的 多元化经济转型*

丁 隆 王炳茜

【内容摘要】 地租国家理论聚焦资源型国家地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解读中东产油国政治经济底层逻辑的重要理论。“海湾例外论”成为地租国家理论迭代的关键转折点，晚期地租主义由此应运而生。进入晚期地租时代，经济多元化成为海湾国家的共同发展路径。近年来，受国际油价波动和全球能源转型驱动，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产油国出现更积极、更具全球化和战略化的经济转型新动向。各国相继出台转型发展战略、依托能源培育新动能、扶持本土龙头企业、推行投资立国方针以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试图摆脱传统地租经济模式，增强经济韧性与活力，提升综合治理能力。但海湾国家经济转型成效未达预期，仍面临债务高企、食利惯性、再食利化陷阱和政治经济相互掣肘等多重挑战，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也难有根本改变，地租主义模式仍将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

【关键词】 地租国家理论 晚期地租主义 海湾国家 政治经济转型
多元化

【作者简介】 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邮编：200083）；王炳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级翻译（北京 邮编：100017）

【中图分类号】 F1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6)04-0071-23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604004

* 本文系 202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经济转型发展研究”（22JJD79005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及《国际展望》编辑部提出的宝贵意见。

海湾国家^① 经济高度依赖石油收入，具有显著的地租性（或译为食利性），是典型的地租国家。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现为：国民经济单一依赖石油收入，政府掌控石油收益，进而控制整个政治体系。地租国家理论（Rentier State Theory, RST）能够有力解释石油租金（oil rent）引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剖析海湾产油国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然而从 20 世纪末期以来，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和全球能源转型等因素影响下，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石油地租的弊端，相继推进国家转型，以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和经济多元化。随着地租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学界不断对该理论作出修正。澳大利亚学者马修·格雷（Matthew Gray）以此为契机，提出适用于海湾国家的晚期地租主义（Late-Stage Rentierism）理论。在全球多极化演变、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海湾国家开始向晚期地租时代转变。从晚期地租主义理论视角研究海湾国家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晚期地租时代这些国家经济转型进程及其政治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定位

（一）地租国家理论的研究对象及理论核心

地租国家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地租国家。1970 年，伊朗学者侯赛因·马赫达维（Hossein Mahdavy）首次将地租国家定义为经常接受大量外部租金的国家，且提出外部租金是指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向特定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支付的租金。^② 1987 年，埃及学者哈齐姆·贝卜拉维（Hazem Beblawi）和意大利学者贾科莫·卢西亚尼（Giacomo Luciani）进一步细化地租国家概念，提出地租国家必备的四要素：第一，地租经济占据主导地位。^③ 第二，地租具备外源性。只有依靠外源租金，地租国家才能在缺乏生产性产业的情

① 本文中的“海湾国家”指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即沙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

② Hossein Mahdavy, “The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ntier States: The Case of Iran,”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28.

③ Ibid., p. 51.

况下维持国内经济运转。^① 第三，社会多数群体从地租收入分配中获益，只有少数群体参与地租创造。^② 通常情况下，这部分少数群体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其四，政府掌控地租收入。^③ 政府是地租收入的首要获取者，并会直接或间接支配地租收入。

地租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地租主义（Rentierism）。地租主义是指非生产性地租收入对地租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经济结构失衡。因石油产业崛起，地租国家无需对土地进行实质性开发或改造，便能在短期内获取巨额外部收入，导致其农业、工业及服务业被严重边缘化。马赫达维认为，地租国家未将石油地租用于发展制造业，会进一步加深对地租的依赖，加剧经济结构扭曲。^④ 第二，以分配换取社会稳定。卢西亚尼（Giacomo Luciani）认为，地租国家属于分配型国家，而非生产型国家，分配地租收入是其国内唯一的经济关系；^⑤ 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认为，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掌握石油收益分配权，且充当石油收入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唯一中介。^⑥ 地租国家通过不征税、高福利的方式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弱化民众的政治诉求，以此换取民众的顺从，^⑦ 形成“不纳税、无代表”的社会契约，进而规避政治改革压力。第三，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石油租金助长寻租行为，降低行政效率，导致公共部门凝聚力与权威性下降。^⑧ 地租国家虽依靠资源出口积累大量财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

① Hossein Mahdavy, “The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ntier States: The Case of Iran,” p. 52.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p. 428.

⑤ Giacomo Luciani, “Allocation vs. Production St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Giacomo Luciani, ed., *The Arab State*,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70.

⑥ Michael Lewin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3, 2001, p. 333.

⑦ Mahmoud Abdel-Fadil, “The Macro-Behavior of Oil Rentier States in the Arab Region,” in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 83.

⑧ Terry Lynn Karl, “Oil-led Development: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of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p. 18, https://fsi9-prod.s3.us-west-1.amazonaws.com/s3fs-public/No_80_Terry_Karl_-_Effects_of_Oil_Development.pdf.

列，却未能实现社会、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全面现代化。^①

（二）晚期地租国家理论及晚期地租主义

地租国家理论的适用性危机催生了晚期地租国家理论（Late-Stage Rentier State Theory）。地租国家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石油繁荣期，基于当时中东产油国的实践提出，但难以解释 20 世纪末海湾国家出现的政治经济新动向，如以迪拜为代表的服务业驱动型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科威特议会政治的发展等。据此，晚期地租国家理论对地租国家理论进行了发展与完善，其演进主要经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成长期，以分领域的细节修正为主，主要分化为专业地租国家理论（Specialized RST）和条件地租国家理论（Conditional RST）；^② 第二阶段为成熟期，形成了以晚期地租主义为核心的体系化研究框架。

在第一阶段，专业地租国家理论将地租国家理论与各专业学科相结合，通过跨学科交叉分析提升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入早期地租时期的“国家—社会”互动因素，从动态视角分析地租时期的特征；第二，结合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巨额租金虽使产油国经济更富裕，却并未带来国内政治稳定，也未提升海湾地区整体安全水平；^③ 第三，关注大国因素，能源价格波动、战略调整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均被视为外部势力干预海湾国家事务的诱发因素。条件地租国家理论则侧重于修正早期地租国家理论的不足，对原有理论细节进行调整与拓展。首先，它纠正了早期地租国家理论中国家高度自治的观点，认为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统治阶级始终面临革命与暴力等威胁。^④ 其次，部分学者对地租因素展开创新研究。例如，英国学者斯特芬·赫特格（Steffen Hertog）探讨了石油租金下的社会寻租网络与国家官僚机构对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影响。^⑤

① Michael Lewin Ross,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p. 328.

② Matthew Gray, “A Theory of ‘Late Rentierism’ in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in Qatar, 2011, p. 9, https://www.files.ethz.ch/isn/134326/No_7_MatthewGrayTheoryLaterRentierismArabStatesGulf.pdf.

③ Ibid.

④ Ibid., p. 15.

⑤ Steffen Hertog, *Princes, Brokers, and Bureaucrats: Oil and the State in Saudi Arab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在第二阶段,即进入 21 世纪后,晚期地租国家理论向解释“海湾例外论”的区域化、国别化研究方向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澳大利亚学者马修·格雷于 2011 年提出的晚期地租主义。格雷认为,在解释海湾国家转型时,地租国家理论被过度简单化使用,^①不足以解释其转型趋势。相较而言,晚期地租主义是以 20 世纪末期油价波动为现实背景的“后期”理论,在不否定地租主义的前提下,强调海湾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非地租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格雷提出晚期地租主义聚焦海湾国家因非地租因素形成的更积极、更具全球化的战略思维,^②主张这些国家试图更合理地利用石油财富,展现出日趋成熟的国家治理观念;并认为海湾国家已从传统的地租国家转变为晚期地租国家,具备制定积极的经济发展战略、渐进式融入全球经济、形成以能源为背景或以能源为驱动的经济实体、以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为代表的国家金融体系等新特征。

作为分析海湾产油国政治经济特征的理论之一,晚期地租主义旨在解释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海湾国家如何推进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契约转型,旨在解决对石油资源的过度依赖及其衍生的问题,并维系王室统治的稳定。作为晚期地租国家理论的代表性学说,晚期地租主义突破了地租单一变量的分析局限,既正视地租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又针对性地修正地租国家理论的原有不足,为研判海湾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视角。

(三) 既有研究的局限与本文研究定位

关于地租国家的既有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了海湾国家等主要产油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以及它们在油价波动、石油储量下降、碳达峰碳中和等挑战下逐步向晚期地租主义过渡的特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但上述研究仍存在不足,未充分关注海湾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再地租化”现象。在此轮去地租化改革中,海湾国家重视对外投资,发展房地产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但这些产业创造的收入同样具有地租属性,导致其经济出现“再地租化”趋势。

自地租国家理论问世以来,从外部涌入的租金收入对经济的影响始终是

① Matthew Gray, “A Theory of ‘Late Rentierism’ in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p. 2.

② Ibid., p. 19.

学界讨论的焦点。^① 在地租主义理论与晚期地租主义理论的理论分歧中，经济维度的分歧最为突出。由此可见，经济转型显然是海湾国家转型的重中之重。在海湾国家内外环境发生剧变的背景下，探讨其经济转型走向及政治影响具有新的研究意义。本文拟以海湾国家从地租国家向晚期地租国家转型为背景，运用晚期地租国家理论的最新成果——晚期地租主义，重点探讨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呈现的新特征，并评估其成效。

二、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呈现晚期地租主义新特征

海湾国家经济转型以石油财富为物质基础，以弱化经济体系的石油依附属性为主要目标。经济多元化普遍被视为海湾国家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路径。世界银行将经济多元化定义为“通过国内生产和贸易结构多样化，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② 20 世纪 70 年代，海湾国家首次将经济多元化提升至国家顶层政策层面。^③ 沙特在首个五年发展规划（1970—1975 年）中，将“收入来源多元化、降低石油依赖”列为其经济发展核心目标之一，并围绕制造业、农业等非石油产业制定量化发展指标。自此，经济多元化逐步成为海湾国家的发展共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成立后达成的首个经济一体化协定，同样倡导推进产业多元化建设。^④ 经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油价的大幅震荡，海湾国家进一步意识到推进经济多元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⑤ 经济多元化政

① Meliha Benli Altunisik, “Rentier State Theory and the Arab Uprisings: An Apprais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42, 2014, p. 77.

② “Aid for Trade at a Glance: Maintaining Momentum,” OEDC/WTO, July 15, 2009, p. 142,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09/07/aid-for-trade-at-a-glance-2009_g1ghb3eb/9789264069022-en.pdf.

③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Economies,” United Nations, 2001, p. 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59099?v=pdf>.

④ *The Unified Econom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1981, p. 3,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3105/download>.

⑤ *The Econom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tates (The Economic Agreement)*,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2001, p. 8,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policy-repository/economic-agreement-between-gulf-cooperation->

策的重心也从早期单纯延展石油红利周期,转向对冲油价波动带来的衍生经济冲击。

面对国际油价下跌和全球能源转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海湾国家愈发重视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推进经济多元化的战略意义。中长期发展愿景规划引领下的海湾国家新一轮经济多元化进程呈现出晚期地租主义的新特征。

(一) 多元化经济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

传统地租国家理论认为,地租国家具有高度自主性,经济上仅需向公民分配租金,无须开展其他经济活动,政治上独立于民众与社会。卢西亚尼甚至认为,这类国家无须制定经济政策。^①事实上,海湾国家并未忽视经济治理,而是形成了契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体系,并着力推进以“去石油化”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为此,海湾国家相继出台中长期愿景规划,力图发挥石油地租的正向作用,以实现经济多元化转型。20世纪末,海湾国家陆续推出经济发展长期规划。阿曼是海湾国家中最早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的国家,于1995年提出“阿曼2020愿景”(Oman Vision 2020)。此后,其余五国相继出台同类规划,覆盖能源、财税、科技、交通、就业等多个领域,旨在启动全面的经济改革。

海湾国家的愿景规划存在诸多共性特征。第一,制定规划的动因相似。各国均在国际油价下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持续凸显的背景下,制定相关规划。此外,为保障规划的实施,部分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2015年,沙特组建经济与发展委员会,由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亲王担任主席,该机构之后承担着沙特“2030愿景”的推进工作;巴林经济发展委员会、阿布扎比经济发展部、迪拜经济发展部等也属于同类专项管理机构。第二,发展目标趋同。无论是中长期愿景还是短期计划,各类规划的核心目标均是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私营部门、鼓励研发与创新、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依托资金与科技创新赋能,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转型路径相仿。海湾国家普遍重视发展石化、航空航运、现代服务、公共服务等重点产业,同时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外

council-states-economic-agreement.

① Giacomo Luciani, “Allocation vs. Production St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 76.

国直接投资、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建立高科技产业园区等配套措施助力产业建设。第四，实践指向统一。各类愿景规划成为海湾国家经济转型的行动路线图。相关文件均明确指出原有石油依赖型经济模式的弊端，并针对性制定解决方案，为各国经济转型指明方向。

（二）经济发展模式向“能源驱动型”转型

当前，海湾国家经济模式正由“能源中心型”转向“能源驱动型”。对海湾国家而言，石油是其国民经济的命脉。^① 依托资源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石化产业及高能耗重工业，成为其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② 为应对油价波动带来的冲击，海湾国家以石油地租收入为基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点培育非石油经济，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能源中心型”转向“能源驱动型”。

海湾国家的经济多元化属于“垂直型”模式，^③ 呈现出由单一产业向多元领域延伸拓展的趋势，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产业。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依托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发展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经济转型。海湾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缺乏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难以通过引进加工制造业完成转型。^④ 从国土规模来看，除沙特外的五国均为小型经济体，不具备发展大规模产业的条件。从历史经验来看，地租国家早期多元化尝试均高度依赖自然资源。^⑤ 进入晚期地租时代，海湾国家转变发展理念，依托油气收入形成的资金优势，将非石油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多元化的重要引擎。非石油产业发展开辟的新路径，为海湾国家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根据世界银行 2025 年的统计预测，受益于非石油产业的强劲增长，海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

① Hazem Beblawi,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ulf: A Socioeconomic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188.

② Matthew Gray, “A Theory of ‘Late Rentierism’ in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p. 31.

③ Martin Hvidt,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GCC Countries: Past Record and Future Trend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3, p. 35, <https://researchonline.lse.ac.uk/id/eprint/55252/>.

④ Tim Callen et al.,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the GCC: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cember 14, 2014, p. 11,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4/sdn1412.pdf>.

⑤ Martin Hvidt,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GCC Countries: Past Record and Future Trends,” p. 9.

从 2023 年的 0.3% 升至 2026 年的 4.5%。^①

海湾国家普遍采取“三步走”策略推进经济多元化。第一步，利用资源禀赋，重点发展石油、天然气中下游产业，提升资源附加值，如沙特的石化工业、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工业、阿曼的化肥工业、巴林的电解铝工业等。第二步，培育非石油领域优势产业。例如，阿联酋依托西亚和北非地区重要的贸易与航运枢纽地位，优先发展物流业和航空业；20 世纪末，科威特凭借海外投资获得丰厚收益，遂将金融业和海外投资确立为支柱产业，发展此类优势产业旨在更好地发挥资源禀赋效应。第三步，布局高科技产业。海湾国家依托区位与资本等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大力发展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物联网等新兴产业。海湾国家不仅面临石油资源渐趋枯竭的长期挑战，而且承受着全球能源转型带来的外部压力。为此，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已提出于 21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与此同时，能源转型也为海湾国家开辟了新的产业赛道，石油脱碳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投资价值凸显，可再生能源项目则为其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助力实现能源替代、拓宽收入来源。

（三）经济上实行新型市场经济模式

海湾国家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具备较强的计划性，由此形成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海湾国家依托丰厚的石油收入，组建了一批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运营高效、盈利能力突出、国际竞争力较强，在行业内居于领先地位。^② 而传统地租国家的国有企业多在重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背景下设立，易陷入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和“软预算约束”的依赖，^③ 进而形成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腐败猖獗、缺乏经营自主权的局面。海湾国家的国有企业则不太受上述负面因素限制，其以盈利为导向、拥

① GCC: Growth on the Rise, but Smart Spending Will Shape a Thriving Future, World Bank, June 19,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5/06/19/gcc-growth-on-the-rise-but-smart-spending-will-shape-a-thriving-future>.

② Steffen Hertog, “Defying the Resource Curse: Explaining Successfu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Rentier States,”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2, 2010, p. 263.

③ János Kornai, “Resource-Constrained versus Demand-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Vol. 47, No. 4, 1979, pp. 801-819.

有经营自主权、运营高效、鲜有腐败问题。^①

海湾国家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业绩优异，已成长为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国家冠军企业是指获得政府支持、以国家力量助力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海湾国家的国家冠军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普遍由王室成员、商业家族、社会精英经营，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② 海湾国家的国家冠军企业兴起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主要集中在能源和金融领域。2000 年前后，航空、电信、房地产等领域的国家冠军企业开始崛起。这类企业依托海湾国家优势产业发展壮大，逐步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阿联酋航空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等国家冠军企业，已多次入选《财富》杂志的世界 500 强和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的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榜单（见表 1）。

海湾国家国有企业的高效运营和国家冠军企业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第一，巨额石油出口收入与长期财政盈余，为政府投资的资金密集型工业项目提供充足资金支持；第二，依托海湾国家丰富的油气资源优势，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企业还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第三，海湾国家的国有企业虽与政府联系紧密，但拥有高度经营自主权；第四，企业领导虽多为王室成员，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由王室聘用并直接向其负责，^③ 且企业享有隐性政治保护，能够规避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过度寻租行为；第五，企业在人才选聘、薪资报酬、组织架构等方面较为灵活且拥有自主权，对高端人才吸引力较强，员工忠诚度较高、流动性较低。以上这些为企业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① Steffen Hertog, “Defying the Resource Curse: Explaining Successfu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Rentier States,” p. 264.

② Giacomo Luciani, “From Private Sector to National Bourgeoisie: Saudi Arabian Business,” in Paul Aarts and Gerd Nonneman, ed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6.

③ Steffen Hertog, “How the GCC Did it: Formal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of Successful Public Enterprise in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ountries,” in Alissa Amico, ed., *Towards New Arrangements for State Ownership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2, p. 78.

表 1 2024—2026 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榜单中的海湾国家企业

2026 排名	2025 排名	2024 排名	公司名称	所属 国家	主营 业务	公司 评价
35	38	36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沙特	油气	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公司
100	105	128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阿联酋	油气	全球最具韧性的石油公司
139	136	149	沙特电信公司	沙特	电信	中东地区增长最快品牌
152	146	177	阿联酋电信	阿联酋	电信	中东和非洲地区最有价值的电信品牌
238	280	344	阿联酋航空	阿联酋	航空	中东最大航空公司
244	245	259	卡塔尔国家银行	卡塔尔	金融	中东最大金融机构
259	309	354	拉杰赫银行	沙特	金融	全球最大的伊斯兰银行
414	461	/	沙特国家银行	沙特	金融	海湾地区最大银行
417	/	/	酋长国迪拜国民银行	阿联酋	金融	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银行之一
473	/	/	阿布扎比第一银行	阿联酋	金融	全球最安全的金融机构之一
495	496	491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沙特	化工	全球第四大石化产品生产商
497	/	/	卡塔尔航空	卡塔尔	航空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品牌金融相关排名自制，*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Most Valuable and Strongest Global Brands*, Brand Finance, <https://brandirectory.com/rankings/global/table>。

（四）对外投资布局契合经济转型战略

海湾国家通过出口石油获得大量外汇收入，为应对国际油价震荡、地缘冲突等外部因素带来的经济冲击，它们陆续设立专门的对外投资机构，统筹配置石油盈余资金参与全球资本市场投资，将不可持续的石油收入转化为持久且可再生的国民财富，提前谋划能源转型下的晚期地租时代经济格局。^① 主权财富基金是海湾国家参与全球投资活动的重要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的研究数据显示，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占海湾国家全部对外总资产的比重达 22%。^② 该类基金通过国际投资活动，平抑油价和汇率波动造成的负面冲击，成为助力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落地的关键抓手。同时，主权财富基金深度嵌入各国中长期发展规划、对接顶层国家发展战略，在转型路径规划层面发挥引领作用。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现已发展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截至 2024 年 9 月，海湾国家头部主权财富基金合计资产管理规模突破 4.48 万亿美元，这一体量约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总规模的三分之一。^③ 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在 2025 年全球前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中，海湾系主权财富基金占据四席。^④

主权财富基金是海湾国家发展非石油产业的重要投资平台。伴随油气财政收入逐步回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收益将成为海湾国家重要的替代性财源，持续为本土经济建设注入资金，帮助海湾国家抵御各类外部风险。2026 年美以伊战事冲击海湾区域经济，在当地航空、旅游、物流等多行业陷入困顿、经济下行压力抬升的情形下，海湾国家据此重新评估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布局，调整资金投放优先级，将资金重点投向国内基础设施重建、产业

① Farouk EI-Kharouf, Sulayman AI-Qudsi, and Shifa Obeid, “The Gulf Corporation Council Sovereign Wealth Funds: Are They Instruments for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or Political Tools?”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9, No. 1, 2010, p. 132.

② *Economic Prospects and Policy Priorities for the GCC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cember 5, 2023, p. 34,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cr/2023/english/lgccea2023001.pdf>.

③ 李学华：《海湾主权财富基金看好中国》，《经济日报》2024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

④ *Top 100 Largest Sovereign Wealth Fund Rankings by Total Assets*, 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 <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

复产、供应链管控与社会稳定领域。^①与此同时，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海外投资布局与本国经济转型导向高度契合。例如，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募资 256 亿美元，^②相关募资全数划转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统筹用于海内外非石油产业布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加速转向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等高附加值赛道。沙特、阿联酋均已布局人工智能、算力等前沿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五）财税制度改革推动发展模式转型

在高福利、低税收社会契约的约束下，海湾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长期承压。各国试图通过财税制度改革，推动发展模式由分配型国家逐步向生产型国家转型。一方面逐步削减各类财政补贴，避免陷入“油价下跌—财政危机—维持福利—危机深化”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借鉴国际成熟税制，拓展税基，搭建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培育国民纳税观念，推动税收成为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缓解油价震荡带来的财政风险。^③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拉开了海湾国家补贴政策改革的序幕，阿联酋率先启动相关改革。^④2014 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之后，海湾国家开始大幅削减补贴。首先，各国补贴政策改革均从上调燃油售价入手，但落地路径各不相同。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推行燃油价格与地区和国际市场价格联动机制，采取分步渐进式调价；科威特、沙特和巴林选择一次性大幅抬升燃油定价，其中沙特和巴林在基准定价落地后多次临时调整油价，科威特则在调价后长期保持油价稳定。^⑤其次，多国削减水电补贴。多数海湾国家实行居民、工商业差异化水电定价，工商业端水电提价幅度低于居民端，以避免削减补贴

① Hadeel Al Sayegh et al., “Gul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Were Built for a Rainy Day. This May Be It,” Reuters, March 6, 2026, <http://reuters.com/business/energy/gulf-sovereign-wealth-funds-were-built-rainy-day-this-may-be-it-2026-03-06/>.

② 王林：《沙特阿美本土上市》，《中国能源报》2019 年 12 月 16 日，第 7 版。

③ 同上。

④ Mohammad Al-Saidi, “Instruments of Energy Subsidy Reforms in Arab Countries—The Case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Countries,” *Energy Reports*, Vol. 6, Suppl. 1, 2020, p.70.

⑤ Tom Moerenhout, “Fuel and Electricity Reform for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in the Gulf,” in Ashraf Mishrif,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 196-201.

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升高。最后，部分海湾国家下调公务员薪资或津贴。

海湾国家普遍税率偏低、税基狭窄，整体税制运行效率有限，税收创收规模偏小（见图 1）。^①



图 1 2014—2023 年沙特和阿联酋的税收占 GDP 的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GC.TAX.TOTL.GD.ZS>。

进入 21 世纪后，引入增值税成为海湾国家税制改革的突破口。2018 年，沙特、阿联酋率先按 5% 标准税率开征增值税；巴林于 2019 年落地该税种；阿曼则在 2021 年正式实施。受新冠疫情和国际油价下行双重冲击，海湾国家进一步上调增值税率，其中沙特在 2020 年 7 月将标准税率由 5% 提升至 15%，上调后税率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② 消费税是海湾国家引进的第二大税种，沙特、阿联酋自 2017 年第二季度起，针对烟草、碳酸软饮料等特殊消费品分别征收 50%、100% 不等的消费税。^③ 2019 年，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曼陆续参照《海湾合作委员会统一消费税协议》（GCC Unified

① “Tax Policy Reforms in the GCC Countries: Now and Ho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ovember 10, 2015, p. 4,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5/111015.pdf>.

② 丁隆：《中东经济秩序面临历史性重塑》，《环球时报》2020 年 6 月 3 日，第 14 版。

③ 《开源节流——看沙特未来四年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商务部网站，2016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chinca.org/cica/info/55762>。

Excise Tax Agreement），实施同类特种消费税政策。所得税是海湾国家引进的第三大税种，该税种的征收范围逐渐扩大，税率渐趋平稳。目前，海湾六国均已引进企业所得税，其中巴林引进时间最晚，常规适用税率最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阿曼拟自 2028 年正式开征，将成为首个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海湾国家。

三、对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成效的评估

为推进经济多元化转型，海湾六国均出台了系列改革政策，但鉴于具体国情差异，各国的去石油化推进节奏与多元化落地成效不尽相同。海湾国家的经济多元化实际转型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阿联酋、沙特为代表的“领头国”，两国多元化政策布局最积极、落地成效最突出、受关注程度最高，不仅在海合会内部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阿联酋整体油气储量虽位居全球前列，但分布不均，油气资源高度集中在阿布扎比酋长国；阿联酋的迪拜依托区位、贸易与资金优势，补齐能源短板，在非石油产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非石油产业根基仍相对薄弱，脆弱性显著；沙特是海湾地区石油储量、经济体量居首位的国家，在布局海外投资、引进如增值税的财税改革等多元化政策方面都发挥了带头作用，但也面临国内高人口增长率、高失业率的双重压力，财政压力与日俱增。第二类是以卡塔尔、科威特为代表的“响应国”。两国油气资源较为丰富、改革内生动力偏弱，多元化起步偏晚。卡塔尔与阿联酋的改革逻辑相似，依托区位和资金优势打造国际化都市集群，大力发展航空、旅游等非石油产业；科威特除拥有可观的石油储量外，还是海合会中唯一设立代议制国民议会的海湾国家，其多元化政策落实受议会制约，如科威特的首个“2035 愿景”就因可行性不足被搁置，后续由其新内阁提出的新版“2035 愿景”获议会批准后才得以实施。第三类是以巴林、阿曼为代表的“跟随国”。两国油气资源储量最少、财政压力最大、经济改革紧迫性最强。巴林、阿曼是最先制定长期

规划的国家。^① 巴林文化氛围较开放，对异质文化包容度高，融入经济全球化意愿较强。但两国经济体量偏小、多元化政策落地进度偏慢，整体经济对石油行业仍呈现较强依赖性。

虽然推进经济多元化已成为海湾国家的普遍共识，但各国转型落地实效整体不及预期。进入 21 世纪，海湾国家 GDP 与国际油价高度联动，反映出海湾各国尚未改变与石油地租深度绑定的格局，非石油产业与石油产业的发展差距依旧明显。以石油储量较少的阿曼为例，由于其工业化起步较晚，1981—2014 年制造业年均增速达 14%，但其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率始终不足 10%。^② 油气资源丰富的卡塔尔、科威特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多年后，油气收入在本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仍高于 50%，^③ 降幅有限。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成效不彰系新旧问题交织所致。一方面，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石油收入，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转型；另一方面，经济多元化政策引发次生效应，为海湾国家带来新挑战。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迪拜模式”获得成功但局限性显著

阿联酋的迪拜是海湾地区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迪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着力发展房地产、金融、旅游、航空等现代服务业，致力于成为全球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迪拜本土石油收入少、内源储蓄体量小、资本市场规模有限，实现经济转型主要依靠外资。一方面，迪拜实施低税率政策，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允许外商投资本金及收益全额跨境汇出，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国际游资大量流入。但一旦其国内市场不景气，外资极易大量流出，导致其国内资产缩水，容易引发金融市场震荡。另一方面，迪拜组建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具体项目运营，甚至通过政府举债支持

①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Economic Inclusion in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States: Findings from an Expert Survey*,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April 5, 2018, p. 6,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research/economic-inclusion-gcc-states-findings-expert-survey>.

② Addisu Lashitew, Michael Lewin Ross, and Eric Werker, "What Drives Successful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Resource-rich Countrie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36, No.2, 2021, p. 188.

③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科威特（2025 年版）》，中国商务部，2025 年，第 12 页，<https://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keweite.pdf>。

本土企业投资房地产、航空和金融等国际市场高敏感行业。相关行业频繁遭受外部环境冲击，不仅直接影响其企业盈利与偿债能力，而且间接增加了其主权债务风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收紧使迪拜外资流入规模大幅萎缩，本土资产价格缩水，房地产价格跌幅近60%，政府担保债务规模达236亿美元，约占当年地区GDP的30%。^①其负债规模远超还债能力，引发区域性债务危机。尽管阿布扎比向迪拜提供了200亿美元专项纾困资金，短期内化解了兑付危机，但其高杠杆举债的发展模式隐患并未根除。金融危机后，迪拜去杠杆化进程并不彻底，政府担保债务压力不降反升。2018年，其政府担保债务高达603亿美元，占本地GDP的比重升至52%，规模约为2009年危机时期的2倍。迪拜的债务困境是海湾国家财政隐患的缩影。2014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后，多个海湾国家首次出现财政赤字，并呈现持续攀升态势（见表2）。海湾国家尝试以债务融资弥补赤字缺口，但债务违约风险随发债规模扩大而上升。据路透社援引标普2020年7月的研判，2020年海合会国家新增政府债务规模会达到1000亿美元，创阶段性历史新高。^②倘若各国政府偿债资金接续不畅，出现实质性逾期，极易导致政府信用危机、全域金融市场动荡，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影响本国社会稳定。

迪拜成功的经济多元化实践成为诸多海湾国家效仿的榜样，但盲目效仿该模式引发了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等地区新问题。一方面，受资源禀赋、生态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结构趋同等因素制约，海湾各国经济转型路径高度重合，普遍布局航空、港口、物流、会展和文旅等产业，未能开展错位竞争。另一方面，海湾国家的石油收入虽被用于发展非石油产业，但多为大规模、重资产、长周期项目。^③基建项目投资因耗资大、见效快，成为海湾国家经济转型中优先发展的产业。近年来，海湾国家几乎都推出了新城建设

① 董彦岭、刘青：《迪拜债务危机：原因、影响及启示》，《财经科学》2010年第2期，第3页。

② Davide Barbuscia, "UPDATE 2-GCC Government Debt to Surge by Record-High \$100 Bln This Year - S&P," Reuters, July 20,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gulf-debt-sp/update-2-gcc-government-debt-to-surge-by-record-high-100-bln-this-year-sp-idUSL5N2ER2QT>.

③ Donald Losman, "The Rentier State and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3, 2010, p. 445.

项目，其中以沙特的未来新城（NEOM）、红海新城、吉达新城和麦地那老城改造项目最具代表性，全系列项目累计规划总投资将超过万亿美元。^① 然而，这些项目普遍规划体量偏大、设计追求超前，不少项目仍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在海湾地区，以往类似项目停工烂尾的情况不在少数，部分竣工项目因入住率低而难逃沦为“鬼城”的命运。

表 2 2013—2022 年海湾国家预算赤字率（单位：%）

年份	沙特	阿曼	阿联酋	巴林	科威特	卡塔尔
2013	5.64	4.68	8.40	-8.88	34.11	21.56
2014	-3.54	-1.08	1.94	-3.46	22.36	15.40
2015	-15.84	-15.94	-3.31	-18.29	5.59	21.71
2016	-17.20	-20.98	-2.82	-17.43	0.30	-4.82
2017	-9.24	-12.55	-1.68	-14.03	6.27	-2.49
2018	-5.87	-8.34	1.12	-11.85	9.04	5.92
2019	-4.39	-4.83	0.44	-8.96	2.89	4.91
2020	-11.15	-16.08	-5.19	-17.86	-12.86	1.33
2021	-2.31	-4.60	-0.96	-6.84	-3.04	-1.86
2022	2.52	5.05	8.08	-2.04	5.76	9.77

注：财政赤字率国际安全线为 3%。

资料来源：“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 Country Economy, <https://countryeconomy.com/deficit>.

（二）食利惯性阻碍转型进程

海湾国家易受食利惯性影响，为解决短期问题背离长期目标，切断原有改革路径，阻碍经济转型进程。“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海湾国家出台的各类惠民措施虽在短期内有利于政局稳定，但有碍长期经济发展。培育壮大私营经济是海湾国家经济转型的共识，也是解决本土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然而，“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海湾国家政府普遍增设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大

^① John Calabrese, “Rebalancing Ambition: Saudi Arabia’s Megaproject Pivot,” Gulf International Forum, May 6, 2026, <https://gulfif.org/rebalancing-ambition-saudi-arabias-megaproject-pivot/>.

幅上调公职人员薪资和福利待遇。沙特内政部新增工作岗位 6 万个，并将公职人员工资上调至私营部门平均水平的 3 倍以上；^① 巴林内政部承诺增加 2 万个新岗位，^② 超过其人口的 3%。公共部门岗位的大规模扩容挤压市场化发展空间、削弱市场内生活力，提升了民众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预期，进一步弱化了私营部门岗位的吸引力，与公私共同发展的长期目标相悖。此外，海湾国家的经济长期规划仍高度依赖石油收入，国际油价频繁震荡带来的次生效应经常影响规划的落地与执行。以沙特的“2030 愿景”为例，其项目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收益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募集的资金。^③ 2020 年，受国际油价暴跌等因素影响，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的海外投资出现巨额亏损，阿美石油公司股价一度跌破发行价，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 50%，^④ 双重因素导致沙特财政压力骤增，“2030 愿景”的部分在建项目被迫中止。

海湾国家依托油气收益形成的高福利分配模式不可持续，福利制度改革也面临多重风险。首先，海湾各国财政补贴政策改革普遍由“降价增补”转变为“提价减补”，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升，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其次，海湾各国政府开征新税种将重塑官民关系，资金不再由政府向民众单向流动，“不征税、无代表”的社会契约效力减弱，税制改革可能成为导致海湾国家社会不稳定的诱因。最后，海湾国家行政收费普遍偏高，罚款收入部分替代了税收功能。以阿联酋迪拜为例，普通小型车辆闯红灯的罚款达 500 迪拉姆（约合 900 元），无证驾驶的罚款达 5 000 迪拉姆（约合 9 000 元）。^⑤ 高额行政罚款已成为海湾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惩戒和教育作用被弱化，引发民众不满。

① Silvia Colombo, “The GCC and the Arab Spring: A Tale of Double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7, No. 4, 2012, pp. 114-115.

② Ibid., p. 116.

③ 高峻：《石油危机周期下的沙特“2030 愿景”与食利国家改革》，澎湃新闻，2020 年 6 月 6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678644。

④ 《沙特阿美公司 2020 年净利润大幅下跌》，新华网，2021 年 3 月 22 日，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3/22/c_1127238117.htm。

⑤ “Dubai Police Traffic Fines (Complete List 2020),” Edarabia, August 27, 2020, <https://www.edarabia.com/dubai-police-traffic-fines/>.

海湾国家为应对危机选择福利兜底的“走回头路”维稳手段，直接反映了其政治稳定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取舍逻辑。然而，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为化解国内各类社会矛盾，海湾国家通常以津贴、补贴和优惠政策等形式安抚民众。海湾国家民众已习惯于政府发放补贴，对其期望值不断提高，进而催生财政领域的“棘轮效应”，即政府每一轮社会维稳都需要投入更多财政资金。长此以往，随着海湾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以福利换稳定”的模式将为其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自 2021 年国际油价步入上升周期，叠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国际原油价格冲至阶段性历史高位。2022 年海湾国家整体石油出口收入突破 5 000 亿美元，同比接近翻倍。^① 其中沙特石油出口收入超 3 000 亿美元，当年实现约 270 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全年经济增长率达 8.7%，远超全球平均水平，GDP 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关口。^② 海湾国家如何用好油价上涨带来的这笔“意外之财”，将决定其经济转型的成败。从历史经验看，石油增收对于产油国经济多元化兼具双重影响：一方面，石油增收为其经济多元化做大了资金盘子；另一方面，石油增收会抑制其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动力。在高油价时期，海湾国家的政府开支与投资缺乏节制，资金使用低效甚至被滥用，致使其财政状况在低油价时捉襟见肘。据彭博社报道，在 2010—2014 年期间，沙特每年低效财政支出规模约在 800 亿—1 000 亿美元之间。^③

（三）再地租化陷阱导致地租经济模式延续

再地租化是海湾国家实施“投资立国”战略的直接后果。海湾国家利用地租收入进行投资，以实现其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可持续性，但因其投资领域多为金融、房地产等高风险、高波动的非生产型领域，催生了其经济再地租化现象。从依赖石油收入到依赖投资收益，并未改变其经济食利性局面，

① “Public Finance of GCC Countries Witnessed Significant Financial Surplus in 2022, 2023: GCC-State”, Zawya by LSEG, December 30, 2024, <https://www.zawya.com/en/economy/gcc/public-finance-of-gcc-countries-witnessed-significant-financial-surplus-in-2022-2023-gcc-stat-tivkvnkr>.

② “Saudi Arabia Posts Budget Surplus of \$27.68 Bln in 2022,” Reuters, March 9,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saudi-arabia-posts-budget-surplus-2768-bln-2022-2023-03-09/>.

③ Peter Waldman, “The \$2 Trillion Project to Get Saudi Arabia’s Economy Off Oil,” Bloomberg, April 21, 201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6-04-21/the-2-trillion-project-to-get-saudi-arabia-s-economy-off-oil>.

这将阻碍海湾国家的生产性经济发展,加深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近年来,海湾国家通过并购和股权投资等方式开展国际投资,收购初创企业、参与境外企业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首次公开募股) 项目。尽管海湾国家拥有资金优势,但其相关投资多以财务投资为主,不介入企业日常经营与技术研发。同时,海湾国家缺乏吸收先进技术、学习管理经验的能力,无法充分利用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海湾国家获取的投资收益仍属地租性收入。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领域除传统能源领域外,还包括农业、医疗、房地产、金融业、酒店业等非能源领域。这些领域增值潜力小、抗风险能力低,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属于高杠杆行业,对市场波动较敏感。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配置亦不合理。在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收益占比最高的是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因此,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收益受经济周期影响波动明显,这与受油价波动影响并无本质区别。近年来,其对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资产投资比例呈上升趋势,对实体经济投资比例较低。以高度虚拟化资产为主的投资组合,不仅无法增强其宏观经济稳定性,而且会加剧其经济食利性、脆弱性和依附性。

海湾国家发展非石油产业主要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等政府投资主体,培育和扶持相关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会带来经济多元化的短期成效,但这种模式将抑制私营部门发展,不利于增强其经济活力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将导致地租经济模式延续。海湾国家的私营经济高度依赖外籍劳动力,其提供的工作岗位对本地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因而私营经济与海湾国家民众之间的联系十分有限,致使私营经济在其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发展潜力未被充分释放、发育滞后。但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实际上更依赖私营部门发展。大部分私营企业拥有较成熟的管理与技术水平,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发展非石油产业的中坚力量。由于公私界限不明晰、产权存在重叠,海湾国家私营部门独立性普遍较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共部门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实现私营经济与国民经济双向促进的正循环,而是表现为单向反馈。

(四) 多元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相互掣肘

首先,经济多元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海湾国家固有的政治经济运行逻辑。

尽管石油收入在海湾国家经济中的占比下降，但其经济转型和投资流向偏重非石油类国有经济部门。海湾国家的收入来源虽发生了变化，但从短期看，新增收入仍具有地租属性，这部分收入从国有大型企业流向政府和王室，地租国家和分配型国家模式并未随经济多元化而发生根本改变，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在实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同时，政治权力在进一步收紧，这也源于自上而下的国家全面转型进程对强有力领导架构的现实需求。上述特征也说明，尽管本轮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空前，但并未导致海湾国家的权力去中心化，反而推动其国族主义思潮持续抬头。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经济多元化将对海湾产油国政府、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带来长期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将催生新的社会阶层，这将对海湾国家的官民关系产生影响，政府将不能继续独立于公民和社会而存在，海湾国家的社会契约也将缓慢变动和调适。

最后，海湾国家的经济多元化进程持续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影响。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产量达到峰值后将呈下降趋势。随着石油时代逐渐落幕，海湾国家建立在财力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将随之收缩。当前，海湾产油国已同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形成能源竞争关系，这将对海湾国家与大国的关系造成复杂影响。海湾国家需要在构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等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随着海湾国家的利益日益多元化，它们难以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采取对冲战略，以期实现盟伴多元化。身处冲突频发的中东地区，海湾国家频繁卷入地缘政治竞争，财力被严重消耗。虽然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但海湾国家仍被巴以冲突、也门内战、美以伊战事等诸多地缘政治动荡冲击，并为此付出巨大经济代价，这也被称为地租国家需要缴纳的“地缘政治税”。

结 语

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紧迫性愈发凸显。受石油

供给有限性制约，石油需求峰值的到来具有必然性，叠加全球能源转型与碳中和目标抑制石油需求增长，石油需求峰值或将提前到来。尽管各界预测石油需求峰值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石油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不可逆转地下降。^① 在石油资源枯竭前实现经济转型已成为海湾国家的当务之急。石油是海湾国家过去和当下主要的收入来源，成为其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然而，石油收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是依托资源禀赋和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规模增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波动型增长。唯有转向高质量发展，才可实现健康、可持续的经济长效稳健运行。

从理论角度看，地租国家理论的演进脉络勾勒出资源依赖型国家经济的转型规律。地租国家理论以石油决定论归纳出一套契合 20 世纪 70 年代产油国政治经济走向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因石油资源富集导致的经济欠发达、政治发展滞后、社会内生动力不足、民众少参与的分配型国家特征。晚期地租国家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的绝对化和笼统概括等不足，从中观和微观视角分析产油国政治经济动态。在向晚期地租时代过渡之际，海湾国家在经济规划、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等领域呈现出新特点。

从实践角度看，海湾国家通过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利用石油收入投资非石油产业，在经济多元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然而，经济转型并未使海湾国家摆脱地租主义，反而造成新旧矛盾交织的困境。晚期地租主义内涵的双重性映射了海湾国家转型的矛盾性：其既希望继续享受石油地租红利，又担心石油地租红利不可持续；既希望通过转型促进经济持续繁荣，又担心转型导致王室权威弱化。在对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进行权衡时，海湾国家始终倾向于后者。经济多元化导致的再地租化现象、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权力集中化的悖论，预示着海湾国家距离后地租时代仍较遥远，社会契约仍难以改变，地租主义仍将长期主导海湾国家政治经济运行逻辑。

[责任编辑：陈 雪]

^① Tom Randall and Hayley Warren, "Peak Oil is Suddenly Upon US," Bloomberg, December 1,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20-peak-oil-era-is-suddenly-upon-u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ignificant actor in upholding an open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KEYWORDS: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surplus of labor, international order

Analysis of Gulf State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te-Rentierism

DING Long and WANG Bingqian

ABSTRACT: Rentier state theory focuses on the link between resource r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rving as a cruci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underlying political-economic logic of oil-producing n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cept of “Gulf exceptionalism” marked a pivotal turning point in the evolution of rentier state theory, giving rise to the concept of “late-rentierism.” In this late-rentier era,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has become a shared development path for Gulf nations. Driven by fluctuations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and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oil-producing nations—led by the Gulf states—are exhibiting new trends characterized by greater proactivity, globalization, and strategic foresight. These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al rentier economic models, enhance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vitality, and improv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measures include launching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leveraging energy resources to cultivate new growth drivers, supporting leading local enterprises, adopting investment-led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reforming fiscal and tax system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Gulf states have fallen short of expectations, as they continue to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high debt levels, the inertia of rentierism, the trap of “re-rentierization,” and the mutual constraints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Overall, progress in “de-oilization” has been lackluster, while risks to social stability continue to rise. Regardless of the ultimat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cial contracts of Gulf states remain unlikely, and rentierism will continue to be a core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political economie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WORDS: Rentier State Theory, Late-Rentierism, Gulf states, political-economic transition, diversification

Japan's Fragmentation Political Dilemm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NG Guangtao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party system realignment and